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项目主持人：乔法容

批准立项时间：1997 年

批准号：97BZX031

中国革命道德与新时期 思想道德建设

本 课 题 组
一 九 九 八 年 八 月

党在十五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我们党的正统,包括政治上的、组织上的、工作作风上的一切好的东西,这是不能否认的。没有这个传统,就不能说明为什么能够维持党,团结党,巩固党,克服党内错误,并同敌人作坚决战斗而得到革命的成绩,造成阶级及人民信任的大政党的地位。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 507 页

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09 页

弘扬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和革命道德传统,吸取人类一切道德成就,努力创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

江泽民为《中国传统道德》丛书的题词

前 言

中国革命道德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思想保证,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核心内容,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条件下,仍具有巨大的精神支撑作用。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实践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弘扬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形成的革命道德;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更离不开对革命道德的传承与弘扬。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江泽民同志为《中国传统道德》丛书的题词是:“弘扬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和革命道德传统,吸取人类一切道德成就,努力创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然而,国内理论界对此尚缺乏深入系统研究(至今无专著出版)。

该课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立足当代,以史为鉴,把着力点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突现出的若干重大伦理问题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研究革命道德在当代中国的传承与弘扬,目的是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四有”新人。全书共分十章:第一章、第二章主要是探讨中国革命道德的形成与特征;中国革命道德与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内在联系。本课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探索,提出中国革命道德的形成与发展大致经历的五个阶段及具备的五大特征;提出中国革命道德与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从中国革命道德到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中国道德的逻辑发展,揭示出两者之间历史的、必然的联系。第三章至第九章,分别就中国革命道德的核心、原则和重要内容作了全面、系统的挖掘与阐述,即: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热爱劳动,艰苦创业精神,实事求是、做老实人的品德。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遇到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我们尤为重视探

索革命道德与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结合点,以其达到弘扬革命道德精神,展示革命道德的当代价值的目的。我们认为,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提出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伦理文化,但主要是在弘扬中国革命道德的基础上概括提出的。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道德的原则——集体主义、以及艰苦奋斗精神等主要内容,就是中国革命道德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第十章,是研究该课题的主旨和目的,这就是培育社会主义的“四有”新人。本章还就革命道德教育的目的、革命道德教育的难点与重点、以及实施革命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作了探析。

该课题的研究,为政府和社会提供了一份可资参考的研究成果。这对于新时期加强革命道德教育,在全社会坚持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倡导艰苦奋斗精神,团结和引导亿万人民奋发向上,促进全民族道德素质的提高,尤其是对青少年和党员领导干部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该项目由于研究涉及的人物多,内容多,从而在全面挖掘资料方面,难免会有遗漏;中国革命道德与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结合点的研究,是该研究课题的难点和重点。尽管我们自觉地做出了很大努力,有自己的探索,但仍有待深化;有些新论点,也还需继续探究。总之,受水平所限,该成果的纰缪与言犹未尽之处,敬请专家与学界同仁赐教。

中国革命道德与新时期思想道德建设

(提 纲)

第一章 中国革命道德的形成与特征

- 第一节 革命道德的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第二节 革命道德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 第三节 革命道德的特征

第二章 中国革命道德与新时期道德建设的内在联系

- 第一节 中国革命道德与新时期道德建设的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 第二节 从中国革命道德到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中国道德的逻辑发展

第三章 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与精神支柱

- 第一节 坚信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 第二节 共产主义理想与信念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精神支柱
- 第三节 在实践中实现理想与现实的具体统一

第四章 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 第一节 为人民服务是无产阶级人生观的核心
- 第二节 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中体现
- 第三节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人的最高价值

第五章 坚持集体主义原则,正确处理义利关系

- 第一节 集体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道德原则
- 第二节 坚持集体主义价值导向,树立社会主义义利观

第六章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献身祖国现代化建设

- 第一节 爱国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
- 第二节 爱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走向复兴的一面旗帜
- 第三节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
- 第四节 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共创祖国现代化大业

第七章 弘扬艰苦奋斗精神,永葆革命者本色

- 第一节 艰苦奋斗是革命事业的传家宝
- 第二节 伟大的创业实践需要艰苦奋斗精神
- 第三节 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反对享乐主义

第八章 发扬热爱劳动的光荣传统,确立主人翁劳动态度

- 第一节 热爱劳动是革命道德的重要内容
- 第二节 热爱社会主义劳动的基本内容 with 要求
- 第三节 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反对剥削劳动思想意识

第九章 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是共产党人的首要品德

- 第一节 实事求是共产党人的优良品格和作风
- 第二节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大力倡导科学精神
- 第三节 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做人、做事

第十章 加强革命道德教育,培育“四有”新人

- 第一节 革命道德教育的目的
- 第二节 革命道德教育的难点与重点
- 第三节 实施革命道德教育的原则
- 第四节 革命道德教育的方法

第一章 中国革命道德的形成与特征

中国革命道德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所形成的道德规范体系。它是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批判形形色色的封建主义道德和资本主义道德的斗争中,为顺利完成不同历史阶段的任务,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逐渐形成的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国主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为主要内容的无产阶级道德体系。中国革命道德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的发展。

本章拟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作些探索。

第一节 革命道德的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革命道德是马列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产生、形成和完善的,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大致经历了萌芽期、初步形成期、形成期三个阶段。在这一时期,它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

一、革命道德的萌芽

革命道德是在现代中国社会大变革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进行,使党的革命影响不断扩大。但由于当时党在革命理论、路线、道路等方面还不成熟,还没有建立红色政权,还没有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因而党的革命影响并不能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地域内发挥主导社会道德的作用,因此,在共产党成立和国民革命时期,革命道德尚处于萌芽、孕育的状态,如革命救国,共产主义理想与信仰,革命牺牲精神等。

(一)爱国

爱国是中国人感受最深,最引以为自豪的传统美德。千百年来,一代代的华夏子孙卫护着养育自己的这块热土。太平盛世时,他们居安思危;内忧外患时,则前赴后继,血洒疆场。这种坚强的“中国心”,铸就了一种为世界所震服的“中华民族精神”。

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所形成的牢固的道德传统,使爱国同忠君最大程度地联结在一起。他们英勇杀敌,奋力保国,有时只是为了保住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他们爱惜人民,考虑的出发点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

20世纪的中国,已在灾难的深渊里苦苦挣扎了半个多世纪。为了挽救灾难沉重的中华民族,千百万仁人志士,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进行了一次次的斗争。

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野,“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当时,在中国还没有共产党,但有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的陈独秀;有立志创建“青春之中华”的李大钊;有“时时涤旧,染而新之”再造中华的毛泽东;有以使“中华腾飞于世界”为志的周恩来;有深入“饿乡”探取火种,以使中国“再生”的瞿秋白;有以“互助群众来谋求

社会之改造”的恽代英……在这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领导下，中国爆发了近代中国反帝斗争史上第一次最彻底的爱国革命运动：五四运动。“五四”运动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锻炼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并促成了一批最先进的爱国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他们开始运用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的问题，他们已明确地认识到，中国的敌人不仅是“抱侵略主义的日本人”和曹汝霖等这些卖国贼，而是整个“强盗世界”。^①因此，“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永远是群众的敌人，也即是国民革命对象”，只有“打倒军阀，方能使反帝国主义运动得到胜利。”^②共产党人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传统，又克服了它的历史的、阶级的局限，自觉地把爱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联系起来。至此，爱国已赋予新的内容，成为中国革命道德的重要内容。

（二）追求真理，坚定共产主义理想

理想，是人们对其活动目标的理性选择，是其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共产党人以解放全人类为自己的目标，以实现共产主义为自己的理想。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方向和奋斗目标，也是其精神支柱和前进动力。

我们追寻共和国先烈和开国元勋们的奋斗的足迹，不难发现，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等都是怀着强烈的爱国情感去追求真理，在经过对比和选择以后，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从而走上了革命道路。之后，不管风吹雨打，流血断头，他们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仰。

毛泽东曾回忆，在长沙求学时代，因急于寻找救国的出路，曾在报纸上登广告，愿意和有志于爱国的青年建立联系，这时在他的思想中，有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但他接触到共产主义的书籍和了解到俄国革命的历史以后，迅速地建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且从此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③

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引入中国的第一人，面对着敌人的一次次恫吓，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仰，并坚信自己播下的种子是会有收获的。他常对子女们说：“你看，农民们辛辛苦苦地种下东西，收获的时候是多么的欢喜呀！他们忘记了辛苦，只有快乐。我们的革命也是一样，现在统治者虽然想尽办法攻击我们……我们是不怕的。我们要挺身和他们斗争到底。我们要用最大的努力把革命的种子撒得到处都是……等到革命成功的那一天，我们会象农民把庄稼收回家来一样的快乐！”^④李大钊以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共产主义精神，坚持斗争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高举革命的火炬，照耀着革命人民前进的道路。

（三）为了广大工农群众的解放而奋斗

“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中国共产党开宗明义，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申明了自己的宗旨。这也是对每个党员政治道德的基本要求。

革命的实践是一所最好的学校。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对人民、对民族关注更加具体。在中共二大的《宣言》中，明确提出党目前的奋斗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使中华民族达

① 李大钊《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页

③ 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

④ 见李星华，《雨天学歌》，载1959年4月14日《中国青年报》

到独立；打倒军阀，实现国内和平，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长远目标则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一个比“一大”纲领更为科学的解释。在中共二大通过的章程和决议案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之急先锋’”“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我们的活动是不离开群众的”。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为民众的解放而奋斗是由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为人民服务这个革命道德的核心在这一时期已经萌芽。

（四）“不自由毋宁死”的革命牺牲精神

自从中国共产党宣布自己的奋斗目标，就招致了一切反动势力的忌恨，他们想方设法扑灭这颗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的火种。因此，当共产党人决定参加革命的的那一天起，就意味着要有流血和牺牲。然而，为了实现崇高的理想，在凶恶的敌人面前，他们无所畏惧；在困难面前，他们毫不退缩；在生死关头，他们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革命的牺牲精神，是中国革命道德的又一崭新内容。

李大钊，在敌人的刑罚拷打面前，在敌人的利诱面前，从容答道：“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念念不忘的是他为之鞠躬尽瘁的革命事业。面对绞刑架，他从容、坚定，表现了对死和对反动派的最大的蔑视。“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为了革命事业，李大钊同志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年仅38岁。但他对革命的耿耿丹心，他的英勇不屈的形象，与山河同在，与日月齐辉！

二、初步形成时期

革命道德的初步形成，始于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然而，共产党人并没有灰心，他们擦干烈士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从地上爬起来又继续战斗了。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地探索革命道路，敌人对根据地的一次又一次围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导致的红军被迫长征等艰苦、险恶的环境，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一种锻炼和考验。在激烈的斗争环境中，一个较为完整的革命道德的体系为全党全军所共守：“真心实意地群众谋利益”，这是革命胜利的“真正的铜墙铁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严密的组织纪律，团结战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实事求是思想等。

（一）“英特纳雄那尔一定要实现”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于一片血雨腥风之中。国民党新军阀的残酷屠杀和镇压，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挫折。党的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革命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许多党的优秀干部、党员被捕牺牲。从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就有32.1万多名党的优秀分子和革命群众倒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党员的人数由大革命时的6万人减少到1万多人。面对着白色恐怖，一些在革命高潮时参加党的不坚定分子有的宣布退党，有的则叛变自首。中国革命

的处境异常险恶。对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都是一种信念的考验。

在巨大的失败面前，他们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们看到的是革命胜利的曙光，因而抱定革命必胜的信念，不屈不挠，勇往直前。“我们在死难的烈士前面，不需要流泪的悲哀，而需要更痛切更坚决地继续着死难烈士的遗志，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中国共产党人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就发动了100多次武装起义，建立了15块革命根据地，开创了适合中国特点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的革命道路。

针对某些人在革命低潮时，农村革命根据地“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情绪，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了明确而肯定的回答。徐特立，迎着1927年的白色恐怖，以50岁的高龄终于加入了他向往已久的共产党。叶剑英、赵博生、柔石等一批党的优秀分子也正是在革命处于逆境的情况下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并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任凭风吹浪打，从没有动摇过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

在举世无双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对每一个将士的政治信仰都是一种考验。没有对革命的坚定信仰，很难想象如何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杨尚昆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概括长征精神的第一条就是“对革命理想和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坚定不移的信念”。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所支撑，在困难面前，他们看到的是光明；面对死亡，他们大义凛然，高唱“英特那雄耐尔（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视死如归。方志敏面对着敌人的威逼利诱，毫不动摇，并在狱中写下了正气浩然的《自述》：“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夏明翰烈士戴着铁铐写的这首气壮山河的就义诗，是他对革命胜利的信心的写照。也是无数个为了革命而牺牲的先烈的共同愿望。

（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战斗的团结的集体，在她的成立之初，就意识到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在革命中的作用。在党的三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教育宣传的决议案中，强调每一个共产党人都要积极地投入到宣传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中去。

坚持集体主义，就必须反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毛泽东强调，只有反对个人主义，才能真正关切人民群众的利益，他指出：“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②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曾突出批评过红军党内的个人主义各种倾向：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雇佣思想、享乐主义、消极怠工及分离思想。个人主义不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应加强教育，从思想上得以根本纠正。

（三）严密的纪律

领导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争取彻底的解放，这是共产党的根本目标。而中国人民面临的敌人不仅有本国的封建势力，还有外国帝国主义，因此就使中国革命的任务更加艰巨。要实现这一任务，就必须使党成为有组织的统一的部队。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说过：“无产阶级的无条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6页

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①

党成立以后,就特别注意建立严格的纪律。中共二大《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明确指出:“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因此,“自中央机关以至小团体的基本组织要有严密系统才免得乌合状态;要有集体精神与铁似的纪律,才免得安那其的状态。”

严密的纪律是秘密状态下党生存与工作的基本条件。党的“八七会议”上特别强调“只有严厉的执行党的纪律才能挽救党的危机”。因此,一切党员,不论其地位如何都应绝对服从党的一切决议和决定。对破坏纪律的,要从严惩办。

井冈山时期,随着中国工农红军力量的不断壮大,如何使革命的队伍真正得到群众的拥护,成为人民的军队,毛泽东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根据斗争的需要,1929年以后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注意,从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以后的革命征程中,这一对红军将士的要求不仅成为革命队伍内部的纪律也是革命阵营内人人共守的道德信条。

遵守纪律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作为最早进入红色区域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公正、客观地描述了他的所见所闻:“我们走过山上的一丛野杏树时,他们忽然四散开来去摘野杏,个个装满了口袋,总是有人给我带回来一把。……但是在我们走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我们在村子里吃的粮食和蔬菜也是照价付钱的”^②

正是由于实行了严格的纪律,党在秘密的状态下得以生存下来,“挽救了党的危机”而且使革命的队伍不断地壮大。

(四)艰苦奋斗精神

艰苦奋斗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并把同革命的目标、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使其成为无产阶级的道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精神,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坚强保证。

自从中国共产党向世人宣布她的目标的那一天起,就得到了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的围攻。在共产党人的面前不是战神就是死神,因此,早在井冈山时期,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已自觉地实行艰苦奋斗。长征途中,面对着险恶的自然环境,敌人的围追堵截,广大的红军将士爬雪山,过草地,斩关夺隘,飞越天险,使艰苦奋斗的精神进一步得到强化。

三、革命道德的形成时期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尤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使革命斗争的形势和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新形势下,如何使党员能够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培养党的干部和对党员的道德教育成为党的工作的重要一环。毛泽东这时期《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著作,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共七大中《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陈云《怎样作一个共产党员》,周恩来的《我的修养要则》等论述,以及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的重要文件和政策、措施等对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页。

^② 《西行漫记》,第57—58页。

中国共产党人应遵守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作了详细和系统的说明。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也以自身的实践履行着这种先进的无产阶级道德。革命道德作为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已完全形成。它包括：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全体党员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道德核心；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集体主义原则；牢固树立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克己奉公，兢兢业业，实事求是、光明磊落，严守纪律，艰苦奋斗等道德规范。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这是共产党人道德的核心和理想人格的主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要求全体党员要“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延安时期，则进而发展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能否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它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共产党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毛泽东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①

为人民服务在实际工作中，就演化为密切联系群众，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群众观点就是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一切向人民负责和一切向群众学习的观点；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为人民谋福利，就是要树立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我们的党从最初起，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我们的党一切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最大光荣和最值得骄傲的地方。“我们要在一切党员和一切人员中，提高自觉性，使我们一切党员和一切人员都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上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②

为人民服务，就是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把人民的利益同党的利益结合起来，不仅要考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而且，要关心群众的日常生活，真切地为他们办实事。抗战时期，中央多次要求各根据地切实减租减息，保障群众的利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③

为人民服务，必须从群众的需要和自愿出发，而不能只从个人的良好愿望出发，必须反对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命令主义是错误的，一方面，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群众还没有决心，不愿实行改革，违背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另一方面，在群众面前，我们要当好小学生，要善于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④ 尾巴主义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害了慢性病，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这同样是要不得的。

为人民服务必须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者都是和为人民服务正相反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1096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4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86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0页。

在这一阶段,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日臻丰富、系统,成为革命道德的核心内容。

(二)集体主义

共产党人以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终身的奋斗目标。因此“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①这种美德,同革命的目标是一致的,它要求我们的共产党人不论在任何时候都应遵循这样一个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地方党组织的利益服从全党的利益,局部的利益服从整体的利益,暂时的利益服从长远的利益”。^②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除了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以外,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个人利益能否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这是考验一个党员是否忠于党、忠于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标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每一个共产党员要自觉地使自己的个人利益同党的利益完全一致,否则就要“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③

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不是一句空话。每一个党员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具体问题上,都要坚决地毫不疑惑地做到这一点,“党内有了这样为革命为党的利益而牺牲一切的党员,才能保证党胜利地完成革命。”^④党的利益是每个党员利益的最高准则,但并不否认必要的个人利益的存在,党员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和教育条件,都应得到保障,以便使他们能安心地工作。“党在可能条件下顾全和保护党员个人的不可缺少的利益——如给他以教育学习的机会,解决他的疾病和家族问题,以至在反动派统治的环境下,在必要时还要放弃党的一些工作来保存同志等”。^⑤

但是,个人的利益必须溶于革命的利益之中,“以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处理一切个人问题”。^⑥把革命的利益和党的利益做为处理一切个人问题的准则,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把集体主义明确为革命道德的原则。

个人溶入集体之中,到延安时期业已成为革命者自觉的行为规范。通过对延安时期各个阶层的接触和采访,斯诺说到他有“一个有趣的发现”。这就是“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但是一旦他参加红军以后,他就把自己给忘掉在什么地方了,如果你不是一再地问他,就不会听到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你所听到的只是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不是因为他们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是因为红军曾经到过那里”^⑦

(三)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使民族摆脱灾难,这是共产党员的责任;拯救人民大众于苦海,这是共产党员人的使命。有了这样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就能不问代价地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长征,本身就是一部英雄主义的史诗。延安时期,共产党人面对着民族的灾难,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去,他们的奋斗、牺牲,使中华民族最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洗雪了千年国耻。

面对重重困难,面对流血牺牲,“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

① 《刘少奇选集》,上,第133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29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31页。

④ 《陈云文选》,1926—1949,第73—74页。

⑤ 《刘少奇选集》,上,第136页。

⑥ 《陈云文选》1926—1949年,第73页。

⑦ 《西行漫记》,第104页。

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①

在困难面前，在强敌面前，在死亡面前，共产党人一无反顾，永往直前。他们不曾后悔过，他们不曾灰心过。坚信胜利就在面前，这是共产党人的革命的乐观主义。“虽然他们几乎全体都遭遇过人生的悲剧，但是他们都没有太悲伤……在我看来，他们相当快活，也许是和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快活的中国无产者。……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着一自信的感觉”。在和红军的生活有了一段体验后，斯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在共产党人的艰难的革命斗争中，乐观向上的态度是革命取得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井冈山时期，坚苦的斗争条件，英雄的红军将士以“红米饭，南瓜汤，餐餐味道香”的乐观态度，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们“万水千山只等闲”。延安时期“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共产党人更是情不自禁地高唱战歌，高唱颂歌，高唱凯歌。彭德怀在同部队战士和当地人民群众观看新编秦腔《穷人恨》后，给剧团写信说：“你们演出的《穷人恨》，为广大贫苦劳动人民、革命战士所热烈欢迎，成为发动群众组织起来的有力的武器”。^②

抗战时期，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中国革命时也明确提出：革命者“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③

不仅如此，要取得革命的胜利，还必须使全体人民和我们党一样有信心，坚信革命一定能够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④ 我们的先锋队有这样的精神还不够，还要启发和提高全国人民的觉悟，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和我们一起去奋斗，这样，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还会有什么“挖不平的呢？”。

（四）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到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共产党人的首要品德和革命道德规范之一。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针对当时一些党的领导人机械地从苏联的模式出发，搞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导致革命力量的严重受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开始了对中国革命的独立思考，经过艰难的探索，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基本形成。但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依然在部分人有相当的影响，为此，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从理论上对党的实事求是作风作了初步的总结。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批评了那些只知从马列书本上“讨生活”的人，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正确的做法是深入社会，作调查研究，做到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斗争的策略。“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党非常重视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制定和调整党的政策。在同国民党的政策上，由于日本的侵略导致的民族矛盾的上升，我们完成了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60页。

② 《延安精神》，第17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1页。

的转变；在农民的土地政策上，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减租减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等在革命实践中，中共已自觉地把实事求是贯彻在党的事业中。

并且，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对党的这一作风从道德意义上做了明确的概括：“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在为延安中央党校的题词时，毛泽东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培养中的重要目标和要求提出来。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光辉文献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了明确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列主义作风，也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怎样做到对事物的客观、全面、本质的认识，做到实事求是呢？毛泽东的回答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

教条主义是实事求是的大敌。为了从思想上彻底克服教条主义，在整风运动中，党中央设置了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亲任主任。各地的领导机关中也相继建立了调查研究工作的机构。在党中央的推动下，全党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在1942年1月率领农村调查团，对陕北几十个农村作了为期一年半的调查后，在写给中央的报告《出发归来记》中，生动地描绘了他调查的愉快心情：“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这就是我出发归来后所抱着的愉快心情”。中央妇委组织了妇女生活调查团下去调查妇女生活问题。调查研究之风的兴起，对于转变党的作风，克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起了积极的作用。

（五）学习

学习是提高党的战斗力的必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不成熟走向成熟，关键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大革命的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几经挫折，党中央和广大干部认识到提高政治、军事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必要性，以及运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总结过去的历史斗争经验的重要，因此，红军长征到瓦窑堡之后，立即成立红军学校，“开始训练连、排、班干部，学习政治、军事，尤其是让不识字或识字少的工农份子学习文化，让他们首先掌握学习工具，以便自己能看书写字。”^①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王稼祥等同志专门报告，要求全党开展学习运动。“加紧学习，学习马列主义、革命运动及中国的历史，从中央委员会各级干部研究较高深的理论起，一直到各机关事务人员学习文化止”。

首先，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要使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武装起来，学习马列主义，掌握马列主义的武器，必须用一切方法使党的干部在工作中学习，在学校中学习马列主义。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对我们这样“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

^① 莫文骅，《谈谈延安精神》，《延安精神》，第24页。

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的理论”。^①

学习马列主义最主要的是要学会灵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们不应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而应看作是行动的指南。马列主义的伟大力量,在于它是与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毛泽东认为,要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切不可把它当作教条看待。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第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使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普遍并深入地开展起来,毛泽东号召全党开展学习马列的竞赛。“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②

其次,对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也要认真的批判吸收,这也是学习的一项任务。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许多民族的优秀的精华,“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③

再次,要认真学习文化技术。我们革命队伍中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居多数,因此,不通过读书,就很难胜任革命的需要,除理论外,还要学习基本的文化知识、管理技术等。

在学习中,正确的学习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共产党人对此予以极大的关注。“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④读书忌懒惰和一知半解,要组织学习小组,互相监督和启发。

为了使党员干部更好地学习,1939年中央设立了干部教育部,根据他们的不同特点分为三大类进行不同的课程设置。后短期轮训改为正规化。

党的领导人不仅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做学习的模范。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随身总是带着书籍,书籍成为他最为宝贵的财富,每到一地总是派人设法弄到当地的报纸,以了解情况;刘伯承,只要不打仗,每天读两小时的书,他常感叹:“对既学来的用之不足,对未学的取之不尽”;朱德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克服灯暗、字小、晃眼串字等困难,坚持学习;陈云提出共产党员的标准之一就是学习。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在延安和其它革命根据地,抗战时期,利用有限时间,抓紧机会学习成为全党和根据地人民的一个重要的生活内容,“旧社会不识字受人欺”“‘学习’二字记得清”,大生产运动中,一首以追求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夫妻识字》歌曲在根据地广泛传唱。

(六)“破坏党纪,实质上就是破坏革命”。

早在1928年党的六大的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就明确规定,“严格的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最为关键也是最为艰难的阶段。中国共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532—53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5页。

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的空前壮大,使党的纪律教育尤为迫切。党的组织纪律建设成为关系到我们能否团结抗战和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

加强党的纪律的重要性被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针对抗战时期,王明不顾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张国焘的反党叛党,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专门就加强党的纪律的重要性作了说明:“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并重申了党的纪律的四条基本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强调了对党员进行纪律教育的必要性:“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则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①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一系列加强党的纪律的文件。

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延安以后,全国各地大批的革命青年纷纷奔赴延安,壮大了革命的力量,随之小资产阶级意识也开始侵入党内。党特别注重对这些人的纪律教育,使带有强制性的纪律为大家所自觉遵守。当然,对那些向党讨价还价,经过多次教育又目无纪律的就要予以制裁,绝不迁就。1938年入党的刘力功,党的训练班毕业后,不服从组织分配,并以退党相要挟,党组织曾七次找他谈话,多方说服教育,无济于事,后被开除党籍。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同志在《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中,这样说到,如果党没有铁的纪律,就不能团结最大多数人民群众,因此“共产党员遵守党的纪律是胜利的必要条件。”“破坏党纪,实质上就是破坏革命”。^②

对党内出现的违纪现象,不管其职务有多大,地位有多高,党中央一律予以严惩。当时担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少年时加入了红军,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和长征。1937年10月,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就将其开枪打死。中央对此事非常重视,由时任陕甘宁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专门审理了此案,并对黄克功处以死刑。毛泽东在致雷经天的信中,一方面惋惜,同时气愤地表示,“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③

对党员干部纪律性的重视和加强,纯洁了党的队伍,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成为抗日的中流砥柱。

(七)明确提出党员领导干部的道德标准

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党的干部则是党的一切决议和政策的执行者,是党的骨干力量,因此对干部的要求应高于对党员的要求。延安时期,陈云《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党员对党要忠实》、《怎样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周恩来《我的修养要则》等对党员和干部应遵守的道德准则做了明确的规定。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528页。

^② 《陈云文选》,1926—1949,第62页。

^③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1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

共产党员的标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做群众的模范；学习；言行一致，光明磊落等。

斯大林同志有句名言“干部决定一切”。我们党的事业能否得到发展，“干部是决定因素”，因此，对党的干部的要求也就不同于一般的党员。提拔党的干部要“德才并重，以德为主”，^①德不是空洞的，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明确的马列主义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忠实于党；坚持原则；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能独立决定工作方向并负起责任；学习；守纪律；重视领导党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除此之外，对在不同岗位上的干部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第二节 革命道德的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被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使中国社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培育社会主义的新人成为一个非常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列主义的观点，根据建国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大力倡导革命道德，使之精神更加发扬广大，内容不断丰富和完善，成为构建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直接前提，换言之，社会主义道德是革命道德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履行的范围也由局部推广到全国，由党员、干部、人民军队扩展到全体人民中间。因而“文化大革命”以前，特别是五十年代，在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几十年来，道德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从而为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但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我国道德的进步并非一帆风顺，具体讲，可分为两大阶段。

一、革命道德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地位的确立，政治制度、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和日益巩固，革命道德赖以生长的基础更加雄厚。在党和政府的大力倡导与推广下，建国后至“文革”前道德建设出现了一个辉煌时期。

(一)拒腐防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思想道德领域里一个紧迫的问题

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早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就手捧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陷入沉思，在革命即将胜利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要求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

1949年10月，毛泽东复电延安人民，号召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思想和作风，并开展了反腐败斗争，使全党形成了一种廉洁的道德风尚。

(二)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革命胜利后，纪律仍不能放松，否则，我们就会重蹈李自成的悲剧。因此，党多次强调纪律

^① 《陈云文选》，第147页。